

孔海珠著

ZUOYI · SHANGHAI

左翼·上海



1934-1936

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和《文报》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国际交流及其他
不可湮没的三封信
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郭沫若
茅盾重写《徐志摩论》
左翼时期被捕牺牲盟员查考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孔海珠著

ZUOYI · SHANGHAI

左翼·上海



1934-1936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翼·上海:1934~1936/孔海珠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

ISBN 7-5321-2467-3

I.左… II.孔… III.文化史-研究-上海市-1934~1936 IV.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7593 号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王志伟

题 字:丁景唐

左翼·上海

1934~1936

孔海珠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3 字数 332,000

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册

ISBN 7-5321-2467-3/K·179 定价:24.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9178575

本书获上海市第十五次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左

翼

·

上

海

(元九三〇一七九三六)

丁景唐



序一

贾植芳

翻阅着堆积在案头上的孔海珠女士的《左翼·上海》书稿时，我不禁想起1990年我们夫妇被邀重访日本时，当时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共产党的老党员丸山昇先生请我喝酒的事。席间，他说：“中国的30年代‘左联’文学，你们中国人现在不研究了，而我们日本人还在研究。”我听了这番话，很受触动。不过，“左联”研究走向冷寂，又确是不争的真实状况。前不久，我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作出这样的预警：“左联”研究陷入停顿，人才凋零，状况堪忧。我想这也并非危言耸听。“左联”研究门前冷落，是不是意味着该领域研究已步入极限，其学术资源已被我们开采殆尽，没有必要再做无效劳动了呢？答案应是否定的。

其实，“左联”的意义远还没有穷尽，其复杂性和历史的深远性甚至远大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其他文学现象。它的发生和演变牵扯到许多方面的因素，一时一地的有限视角可能很难看清“左联”的真正面目，这就需要我们不必急于求成，想毕其功于一役。认识事物是一个过程，我们离“左联”这段历史还不长，难免会有近视的误差，比如我们对“左联”史料的掌握还不够全面，尤其是其后期的史料。历史是不允许想象和假设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对“左联”这段历史，我们更需

要谨慎，因为这段历史是有重量的。理解了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就可能找到对其后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些线索。同时，我们还需对既有的史料作出细致科学的鉴别，去伪存真，去芜存精是我们应做的切要的工作。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份历史遗产传到后世的手中，确凿的材料可能要比仓促的结论更显得重要切实。抢救历史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历史责任。

30年代的中国“左联”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重大历史文化现象，它的发生、发展受当时国际“左翼”风潮的影响，尤其是受苏联、日本的影响，同时也与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环境中形成的文化专制主义有着极大的联系，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阴暗心理就是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所带来的恶果。20年代中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作家对五四作家鲁迅、茅盾、冰心等人进行粗暴批判，他们骂鲁迅是“封建余孽”、“双重反革命”，无情否定“五四”传统。周恩来对中国的政治形势、文化力量的认识颇有远见，指出对鲁迅的围攻是错误的。冯雪峰根据文委书记潘汉年的意见，要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合作，鲁迅也意识到进步作家联合起来的必要性。这样，1930年初，“左联”成立了，鲁迅是“左联”的旗帜。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冯雪峰等是主要负责人。“左联”是30年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它发挥了正面的作用，也产生了负面的教训，它在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革命文学创造以及理论译介方面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巨大成就，可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左联”因为革命文学本身的不成熟以及传统文化积习的作祟，其元气也大大受到了损伤。当时的一些“左联”领导人一方面在利用鲁迅，一方面又不尊重鲁迅。所以鲁迅曾经沉痛地说：他只好“横站”着，一面要防止来自前方敌人的明枪，一面还得小心来自自己阵营里的暗箭。“左联”的负面影响一直在其后的历史中得不到彻底的

清算,那种知识分子内部的“内耗”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在建国后二十年里,鲁迅走了,当年那些追随他的一些人或与鲁迅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就受到了迫害,如1955年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57年所谓“冯雪峰、丁玲反党集团案”就株连了一大批“左联”作家。而这时候,鲁迅仍被作为一面旗帜。“他的方向就是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文革”开始以后,“四条汉子”也被打倒,“左联”文艺给全盘否定。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来的整个文艺历史给加以“一条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线’”的罪名。

80年代,学术界在“左联”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出版了不少关于“左联”的研究资料以及个人回忆录,比如出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汇编》等。到了近些年,“左联”研究开始走向冷寂,可仍有一些人甘守这份清冷,继续在这个领域默默工作,孔海珠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孔海珠从事“左联”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多年,并已有多种科研成果面世。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奠基石,舍此,我们没有直接走近历史的捷径。风风雨雨的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可它所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很多,并伴随我们进入新的世纪。我们的思考和研究应该是建立在可信的史料基础上的,否则,我们的思考就没有依凭,这种时候,就更显示了史料工作的重要性。关于“左联”的史料我们已经掌握得十分丰富了,但是可待发掘的空间仍然很大。因此,孔海珠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与孔海珠女士可算是世交。我很早就看到过她父亲孔另境先生编的《现代作家书简》,是由鲁迅作序的。1951年,孔先生在上海春明出版社当总编辑,约请我的妻子任敏编一本《北方土语辞典》。可能因为南方人很难听懂北方话,意思也不明了,引发了孔另境编这本书的想法。这本辞典收集了陕西延安,包括山西等解放区的北方土语土话,对于北方的风俗习惯和南方的不同地方也有解

释。以后，香港、台湾都有翻印本，旧金山和东京也有译本。因为它对研究解放区文学有帮助，使他们搞懂一些只有中国北方才有的土话。这也是任敏单独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文革”后，孔另境先生的妻子金韵琴给我送来了他的遗著《我的记忆》，才得知孔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中国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作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我脱离了二十多年的监禁与劳改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处境，被“解除监督”，回到原单位中文系资料室当图书资料管理员。当时，全国三十几所高校中文系筹划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聘请我为特约编委，这是“四人帮”粉碎后，我的第一个社会职务。丛书中的《茅盾专集》由复旦中文系的同志协同茅盾的内侄女，即孔另境和金韵琴的女儿孔海珠共同编著。那时，孔海珠正在为茅盾撰写回忆录在上海做资料方面的助手。这样我和她认识了。1979年末，我来到久违的北京，事先已请海珠给茅盾的儿子韦韬写了信，想请茅盾为这套丛书作总序。在交道口的一个四合院，拜访茅盾时韦韬在旁，茅盾视力很差，忘了我是什么人。我说，我是贾植芳。他起先没有想起我是怎样的人。我说，请你给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写个序。他说，我不大为人写序。在旁的韦韬说，你也不少写。他起身进去休息。韦韬对我说，你放心，他会写的。果然不久他将序寄来了，给我们这套丛书增加了分量。198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写了一部七十八万字的《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当时的所长徐俊西同志托我为此书作序，我勉为其难的原因是该书不但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指导现实的意义。我在审读此书的时候，读到孔海珠写的几篇分量不轻的文章，不知她是否是从此时开始从事左翼文化的研究。孔海珠是新中国第一届新闻出版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因成分问题，被分配到上海图书公司做资料员，这倒使她因祸得福，成了李斯所云的“粮库中的老鼠”，利用职务之便，大

饱眼福,给了她一个绝好的学习和研究的机会。80年代初,她作为访问学者,来复旦进修两年,我们就成了熟人。孔海珠出身于文化世家,受家庭环境影响,她对文学、学术有着执着的追求。这些年来,她编著了不少关于茅盾、于伶、她的父亲及家人的资料,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实力。孔海珠新著《左翼·上海》是她近些年研究成果的集成,该书集中于“左联”后期史料的钩沉、查找和研究,填补了“左联”研究的空白,尤其是《文报》的发现和研究,给“左联”后期的组织活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实的史料依据,这为完整地评价“左联”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据。

作此序文,算作我与孔海珠女士两代人友谊的纪念。

序二

王观泉

这部书稿是研究“左联”的，我粗略地看了一下，真是使我惊喜不已。

就我所知，所掌握的“左联”史研究概况，“左联”各盟和30年代左翼文化研究已经延续有三四十年历史了。由于30年代史料整理和出版较迟，始于60年代初，影印30年代“左联”书报杂志的工程，当时就阻力不小，不久又碰上“文化大革命”也就烟消云散了。因此当时的研究大部局限在“左联”和左翼作家的作品分析方面，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论文，但很难谈得上是“左联”史研究的，真正达到规模研究的是丁景唐和瞿光熙合编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文革”运动结束，尤其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学术争鸣的时空氛围下，渐渐有了起色，当瞿秋白，以及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党的领导同志关心“左联”、指导“左联”的事迹或文章发现、公布和深入研究，加上“左联”的重要领导冯雪峰同志沉冤二十余年后重新浮出水面，彰显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贡献，大大地促进了“左联”的历史研究工作。另一喜人的条件是三中全会，时值“左联”盟主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借着这股东风，“左联”、“文总”、“文委”以及30年代左翼文化的研究形成规模，当新版

十六卷本《鲁迅全集》调动起了全国多所大学中文系教师参与注释工作之时，“左联”研究成了热点，并且涉及到曾经是中国“左联”成立、左翼文化获得蓬勃发展和结盟的榜样的前苏联“拉普”和日本“纳普”的研究，致使中国“左联”研究走出国门，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课题，此也刺激了国内学者对于“左联”的研究。

令人感到兴趣的是，随着政策的落实，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曾经因极左思潮而备受到过火批判或不公正对待的如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等等作家及社团流派的再研究。其中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文墨，往往是冲着鲁迅冲着“左联”来的，似乎是鲁迅是“左联”使这些曾经在文坛上活跃的作家的流派成为左翼文化祭坛上的替罪羊。愤愤不平的文墨又引起了鲁迅研究和“左联”研究者的反驳。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在排除了曾经确实存在的极左政治压力之后的唇枪舌剑，却使“左联”和左翼文化研究与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研究双方，都在澄清问题的同时获得进益，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因为在长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战线上，以鲁迅以“左联”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最高纲领的流派，是爱国主义的前卫文学，以胡适以徐志摩等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也是爱国主义的，至少在引进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对于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是一个冲击，是符合当时提出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最低纲领的。不然，中国现代文学史将会成为两个板块无法合拢了。也许正是有了接受教训的一面，才使迄今新时期的“左联”研究立体起来，成果多起来，出现了一些“左联”研究资料，30年代当时人的回忆录，以及集诸家研究成果的论文选集。但是，在不谓不丰富的成果中，由研究者穷年累月钻古纸堆于“左联”单一专项研究，写成的很个性化的专著，尚未出现。好了，现在有了，就是放在我书案上的这部书稿，书名：《左翼·上海》（1934—1936），作者：孔海珠。

一种文学现象，或一个阶段的文学历程，能成为专题研究项目，这必定是能左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课题，“左联”及30年代左翼文化就是占中国现代文学史半壁江山的重要课题。当然，不是说孔海珠已经完善了这个课题研究的方方面面，只是说这是有独特见解有个性的“左联”研究史著作。读者可以不同意她所下的结论或某些观点，但你必定会重视书中所提供的大量史料和“新探”的方法论，若加以再研究，必定会从中有所裨益有所收获有所启示。

《左翼·上海》还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左联”通史，究其与一般论文汇编的不同之处，作者是在总体规划下写成的，据作者《引言》所指陈，本书绝大多数论文研究的是“左联”晚期的历史，这是一个中心议题，论文内容各异，都紧扣中心议题；因此，论文与论文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和互补性，是一个整体。这就有了专著或“左联”断代史的色彩。比如，本书谈“左联”的国际文化交流，其中有一篇牛兰案和怪西人案的文章，这个题目，在以前长长短短的文章已经不少，但大都是在讲故事甚至是猎奇式的演义，把30年代共产国际援助中共与反动派斗争的牵动中外政治势力和进步团体为之呼吁的政治事件，庸俗化了。本书作者研究这件大案立足于政治斗争的高起点，不仅收集了时令各大报刊上的相关资料，而且还从工部局警署系统档案中获得大量鲜为人知的甚至是新近才解密的西文资料，使这两大案，尤其是一头雾水的“怪西人”案真相大白，陈明了国民党和工部局对于国际共运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打击，以及中外进步势力的声援和反抗，并且在长达二三年的斗争中对于两大案件的社会效应，揭示出白色恐怖下革命力量和“左联”的兴（中期）衰（晚期），既符合历史的进程，又演映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上层人物和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伊赛克、斯诺等对于中共地下斗争的支持，从中也可以悟出“左联”盟主鲁迅为首的左

翼进步势力的政治影响力。书中，相同类的文章是不少的，读者可以细细玩味。

孔海珠写这部著作，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公布了不少经她精心筛选辩证研究后的信实可靠的历史文档，其中如《文报》这样的文献是她发现的。她根据这些文档所涉及的诸多内容，拟定了走访相关当时人的采访计划，以启发他们的记忆，使历史遗存与当年参与创造历史者对话得到实证，并赋予历史以新的认识，拓展研究的深度。其中，访问胡乔木、胡乔木致作者的信、新发现的《文报》、对于某些尚未调查清楚的历史人物的深入了解诸方面的问题的一组文章，非常吸引人，对于研究“左联”，漫延开来的研究“社联”，旁及“文总”、“文委”的历史，都有特殊意义。正由于孔海珠对历史人物在采访之前定出了详明的计划和提出启发采访者思索历史的文档资料，因此，收获就非同一般，其中如胡乔木致作者的信，简直已经成为“左联”研究的一份重要的文献。我甚至认为因《文报》的发现而使孔海珠访问胡乔木的回忆录和亲笔信，连同对于夏衍、于伶、沙汀、楼适夷等先辈的访问记，是本书的亮点之一。所存录的史料都很专业很投入，也很有个性。其所闪发的学术价值不是一般的问答所能比拟的。随着历史的推延，孔海珠的“左联”重要人物访谈录，将成为“左联”文档史料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认真地注意到孔海珠对于“左联”分期的研究。她研究的结果是分早中晚三期。

“左联”存在的时间从1930年到1935年末36年初解散，曾经有过前后两期的分法，由于这个分期之于当事人的认识，因此似乎没有什么争论，只是前期和后期的交接时间上有所区别也略有不同的见解见于文字。但经本书作者对于“左联”的编年考查，认为分三期，可能比两期更符合“左联”于社会革命运动；尤其是与中共的第二次革命时期（1927—1936）的进程比较吻合。作者就分期

问题与倾向前后两期分割的夏衍请益。访问者提的问题与被访问者存在不一致的认同感,如何处理?但访问的结果却使作者更坚定了三分其历史阶段,是比较合理的。具体曲直此处就不提了。我只想提一句,也许真应验了旁观者清的思维方式吧。当然归根结蒂提出早中晚三期是作者在社会大背景下考量“左联”分期的一个收获。而当事人的认知总是会受到参与工作的时间和工作的性质所局限,也受制于情绪,这就要考验访问者的研究力度了,而“力度”则源于历史辩证法。

“左联”成立的1930年,是非比寻常的历史年份,在这之前三年——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以“四一二”国共分裂而告终,从此时起,中国共产党进入独立肩负中国革命重任,昨天的朋友今天成为正面战场上的敌人。开始了史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时期,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以中共自身建设来谈,这是一次彻底改变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权的会议。在第五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之交,领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的瞿秋白,后来被迫退出中央领导班子(不久就隐入左翼文化园地),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成为总书记,但实权则掌握在李立三手中,开始了“立三路线”时期。“左联”就是在这个时空条件下成立的。

1928年以中共六大的决策以及同年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就成为立三路线的理论依据和国际左倾(第二次红色风暴)高潮的历史大背景。除瞿秋白外,原先投入北伐的如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以及蒋光慈、钱杏村等等文人重回文坛,恢复创造社和成立了太阳社,成为中共左倾路线在文坛上的喉舌,他们把矛头指向鲁迅,是一种象征。他们认为扳倒鲁迅这个“双重反革命”,中国文坛就是左派(甚至是中共)大一统的天下了。事实正好相反,用鲁迅对此一极左思潮的说法是,创造社是“将在苏

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其结局当然是十分惨的，但更惨的是“左联”成立后第二年即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王明路线，其给中共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了，文艺界当然也深受其害。召开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之交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盟主鲁迅的一次讲话是非常值得重温的，他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一个警示。然而这种警示出现在左倾路线冲昏头脑的时期，又出自一个不久前还被左倾思潮在文坛上代理人视为革命绊脚石的非党作家之口，其能有影响力吗？加上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有冯雪峰的见解在内。现在可以坦率地指出：“左联”盟主由鲁迅担纲，在左倾路线施行之期，又提出“左翼”很容易成为“右翼”之类逆拂当局之言，又加上冯雪峰的见解，这一切就埋下了一旦分裂的地雷。承认这一点，对于历史教训来说是必需的。“左联”成立时的关门主义，中期产生分裂，一部分人跟着鲁迅一步一个脚印地孜孜创作，另一部分人则渐渐成为“工头”；后期则藉1935年共产国际六大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的旗号，由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意见使“左联”险些“溃散”（鲁迅语）；也险些应验鲁迅之所警示的“左翼”很容易成为“右翼”。其实“左联”的下场，与其说是共产国际“国防政府”策略之所为，莫不如说是王明路线的恶果。“左联”如无鲁迅顶着，真地“溃散”了，这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北撤的王明路线（其时已成为逃跑路线）是一致的。军事上反围剿能转危为安，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胜利，文化上反围剿的胜利则是鲁迅及其支持者的硕果。这里不得不留下沉重的一笔：“左联”以1931年2月7日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牺牲起，结束于瞿秋白被国民党枪杀而告终，这个教训是够惨重的。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在孔海珠的《引言》及相关的论文中有很好的表述和研究，颇具说服力地证明“左联”分

三期的研究，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也在弘扬“左联”业迹的同时，指出了“左联”在立三、王明路线的压力下，使“30年代左翼文化”几乎成为“极左”的代词，留下一道深深的裂痕，直到上世纪50年代反胡风反右派整人的和被整的双方重演了“左联”时代的恩恩怨怨，受整的蒙受了30年的耻辱，于是就用得着刘少奇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是我个人借此机会提供的一些见解，假如可以作为本书作者今后研究中的一个参照，也许会使“左联”及30年代左翼文化研究更具历史凝重感。

是为序。

2001. 12. 3